

聯合國、台灣與國際婦女節

●伍維婷／世新大學性別研究所所長

婦女議題與性別議題一向是超越國界，國家或地區的性別運動常常會互相影響、彼此聲援。性別運動團體除了互相學習彼此的倡議解方、運動策略外，也常利用國際各種場合，一起推動國家們的改變。其中，聯合國的各種機制便是國際婦女團體結盟，共同遊說國家們推動性別議題的重要場域。然而，因為台灣於1971年退出聯合國，台灣婦女運動有很長一段時間，是與國際社會失聯的。

直到1999年，台灣婦運界開始參與每年一度，由聯合國「非政府組織婦女地位委員會」（The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Committee on the Status of Women，簡稱NGO CSW）在每年國際婦女節前後，配合聯合國「婦女地位委員會」（Commission on the Status of Women，簡稱CSW）所舉辦年度會議的平行會議。

長期以來，聯合國與婦女相關的三個會議，是國際婦女團體與會員國們共同討論性別議題的平台：首先，聯合國自1975年開始，每五年舉辦一次的世界婦女大會，總計舉辦四屆；再者，自1975年開始，每年在「國際婦女節」（International Women's Day）前後舉辦的「婦女地位委員會」（CSW）年度會議，主要參與者為聯合國會員國，以及平行舉辦，由非政府組織婦女地位委員會（NGO CSW）籌劃邀集各國民間婦女團體參與的會議；最後則是每年在紐約以及日內瓦所召開的《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簡稱CEDAW）國家報告審查會議。

因為中華民國政府的選擇，台灣婦女團體長時間無法藉由聯合國婦女議題的平台，與國際婦團社群互動，更無法在全球性別議題倡議的努力中貢獻。事實上，因為中國國民黨政權在戒嚴時期的管制，台灣婦女運動的發展也一直要等到解嚴之後，才開始努力跟上國際婦團社群的腳步。

1971年，呂秀蓮女士將西方女性主義思潮介紹給台灣社會，同一年，台灣退出聯合國。1979年，國際重要的婦女人權憲章，《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通過，1981年公約生效。台灣最早的女性主義團體，婦女新知基金會，則在呂秀蓮女士因美麗島事件入獄，李元貞女士接棒推展性別議題下，於1982年以雜誌社的形式成立。

隨著民主化的運動，台灣的婦女團體蓬勃發展，包括影響到大學校園的女學生運

動。九〇年代的婦女運動，關注議題以婦女參政、人口販賣、人身安全、工作權、民法修法，兩性平等教育、家務與工作平衡議題、環保議題等為主，從政策倡議到公眾教育，台灣婦團在與國家互動挑戰的過程中，取得顯著的成果。

2022年的台灣，在國際上各種性別評比表現亮眼，例如：性別不平等指數（Gender Inequality Index，簡稱GII），2019年我國性別平等居全球第六名，亞洲第一名（名次越前面代表性別越平等）。台灣的婦女參政比例，更因為《地方制度法》以及憲法增修條文關於政黨比例名單的性別規範，而在與全球各國的比較中，名列前茅。然而，台灣性別議題的推動，在很長的時間並未與國際婦團社群結盟，也未能將台灣的經驗與進展分享到國際社群。

直到1999年，台灣婦女團體開始每年參與聯合國非政府組織婦女地位委員會的會議，婦女團體不僅僅只是藉由參與相關會議與國際婦團互動，更積極藉此協助台灣的外交工作。以下以兩部分介紹台灣婦女團體代表參與聯合國相關會議的過程，以及台灣婦團所建立的國際連結。

壹、台灣婦團走進聯合國

台灣婦團代表走入聯合國參與會議的過程，是一個民間積極參與，逐步遊說政府支持並且也派代表參與的發展，近幾年，從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都有與婦女議題相關的政府部門代表積極參與。台灣婦團走進聯合國，也同樣經歷來自中國的打壓，造成台灣婦團不再如一開始持台灣護照便得以進入聯合國內部，婦團代表曾與外交部共同嘗試解決此一困境，但尚未能克服。台灣婦團並未因此放棄，仍持續參與聯合國「非政府組織婦女地位委員會」的會議，將台灣推動性別議題的成果和困境，與國際婦團社群討論。

自從得以參與聯合國非政府組織婦女地位委員會每年所舉辦的平行會議，台灣婦女團體代表從未缺席，即使這兩年，因為COVID-19疫情的影響，聯合國婦女地位委員會取消實體會議，台灣婦團與政府代表仍積極參與線上論壇與會議。

聯合國非政府組織婦女地位委員會（NGO CSW）的會議是聯合國婦女地位委員會（CSW）年度會議的平行會議。婦女地位委員會於1946年6月設立，為聯合國「經濟及社會理事會」（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簡稱ECOSOC）下的功能委員會之一，針對婦女與政治、經濟、公民、社會與教育領域的發展向社會經濟理事會提出建議，婦女地位委員會同時是具有聯合國諮詢地位的非政府組織與聯合國各國代表之間的橋梁。

非政府組織婦女地位委員會（NGO CSW）於1972年在紐約設立，由跨國以及國家級的非政府組織及個人組成。非政府組織婦女地位委員會長期與聯合國相關的婦女機制互動，並提出倡議訴求，例如：「提高婦女地位司」（Divis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Women，簡稱DAW）、「提升婦女地位國際研訓中心」（International Research and

Training Institute for the Advancement of Women，簡稱INSTRAW）、「婦女發展基金」（Development Fund for Women，簡稱UNIFEM），這三個部門，在2010年正式整合並改組為「聯合國婦女署」（UN Women）。

筆者因為在紐約攻讀博士，曾於2006年爭取到聯合國NGO CSW實習，並從2007年開始擔任NGO CSW年度會議的籌備委員。在NGO CSW與國際婦女團體駐聯合國代表互動的經驗發現，NGO CSW除了定期與聯合國相關婦女機制互動，也利用《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國家報告審議向CEDAW委員以及前來接受審查的各國代表團倡議婦女相關議題。同時，NGO CSW也緊盯聯合國各種議程，例如千禧年發展目標（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簡稱MDGs）、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簡稱SDGs），或者聯合國安理會、人權理事會的各项決議。

台灣婦團每年到紐約參與年度會議時，也都會與台僑社區的婦女組織合作，召開座談會，將台灣最新的性別議題進展與台僑溝通，也共同討論可以更进一步推動性別平等策略。

貳、國際婦女節與國際結盟推動性別議題

每年3月8日的國際婦女節（International Women's Day），是各國婦女團體經過很漫長的爭取，才由聯合國正式確認，將這一天訂為國際婦女節。最早在3月8日舉辦抗議的婦女行動，事實上是與工人運動有關。1857年3月8日，美國紐約的紡織廠女工走上街頭，抗議惡劣的工作環境。之後每年，在3月8日幾乎都會有類似的抗議活動。

1909年3月8日，美國芝加哥超過一萬名女工走上街頭，抗議工時過長、工資過低，並且沒有選舉權。當時，這群婦女喊出「麵包加玫瑰」的口號。1917年3月8日在俄羅斯帝國，紡織工廠的女工在首都舉行罷工以及抗議，此遊行甚至導致俄羅斯革命。國際婦女組織陸續倡議應該將3月8日定為國際勞動婦女節，1960年代，女權運動再起，重新在3月8日舉辦相關婦女議題倡議活動，也持續呼籲各國將3月8日訂為國際婦女節，而聯合國則在1975年國際婦女年，正式宣布3月8日為國際婦女節。

1975年也是聯合國第一次舉辦世界婦女大會，聯合國婦女地位委員會也在這一年之後，每年固定在國際婦女節前後舉辦年度會議，讓國家代表團與國際婦團社群能夠有機會共同討論性別議題。1979年通過的《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1995年第四屆世界婦女大會通過的北京行動綱領，都成為會議上的重要討論指標。

如前述，台灣的婦團代表一直到1999年才開始重回到國際社群的討論平台，當然，在此之前，有幾個資深的國際婦團在台灣便設有分部，例如：崇她社（ZONTA）、基督教女青年會（YWCA），國家婦女會（National Commission of Women）等。不過在台灣解嚴前後的婦女運動中，僅有基督教女青年會較常參與婦女團體的集體行動。

此外，台灣婦女團體雖然在1999年之前，較少機會參與以聯合國為平台的婦女議題討論，但也因為議題的相關性，陸續參與到跨國的婦女連結，例如：慰安婦救援的議題，以及台灣展翅協會在1990年就成為國際終止兒少性剝削組織（ECPAT International）之創始會員。

參、結語

婦女議題一直是超越國界的，台灣婦女團體雖然因為中華民國政府選擇退出聯合國，而長期失去與國際婦團社群互動、學習、貢獻經驗的機會，但，台灣的婦團自1990年代開始蓬勃發展，各種性別法案以及政策的推進，也讓台灣在各項國際性別指標評比上表現亮眼。

過去，台灣婦團靠著外交部少數的資源，積極參與聯合國婦女地位委員會所舉辦的年度會議。但以台灣累積多年的性別運動成果，事實上，若政府能夠提供更多資源與平台協助，台灣婦團是能夠在國際連結上貢獻更多，協助建立國際性別議題的聯盟。相對於中國政府對於婦女議題的漠視，台灣婦團將能擴大國際社會對於台灣的理解與支持！

【註釋】

1. 因為當時國家並不允許除了中國國民黨婦聯會之外的婦女團體成立。◆